



帮带”。疫情封控期间，后辈社区工作者眼里前来支援的杨兆顺，工作特点多多——该奋不顾身的时候年过六旬的他依然冲在前；而遇到麻烦事他又能冷静思考理顺关系再行动，减少了许多无用功。“一个人的精力再旺盛也是有限的，如果光靠个人，迟早扛不住。”杨兆顺对徒弟、如今的紫藤苑书记张斌如此说。在张斌看来，此言一方面是师父对徒弟的忙碌“看不下去”，颇为心疼；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张斌注重发动居民自治的力量。

有媒体报道，今年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先后有905名“老书记”重返曾经长期工作过的社区，与“徒弟”们在一起，战斗在社区抗疫第一线。对于一些更年轻的“95后”社工来说，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老书记”，第一次零距离了解一些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自己婴儿期时，上海社区工作的方法。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段炼说：“上海的社区居委会工作，在全国来说，颇富特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废除旧中国的保甲制度开始，逐步形成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从早期由退休人士发挥余热参与居委工作为主，到逐步正规化，有了全职社区工作者，简称‘社工’。之后又有所变迁，随着商品房小区的增多，这些小区的居委会尽管存在，却一度不常在居民的视野中，反而是物业公司、



在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展出的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纪念牌匾。

业委会成了解决社区矛盾的焦点。这次疫情封控，让社区居委会重新走入视野。未来，如何进一步理顺居委工作，使之更符合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成为题中之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到国家，小到社区，莫不如此……

废保甲，建居委

“学习强国”软件中有一道选择题——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诞生在哪里。正确答案是“杭州市上羊市街居委会”。相关报道称，1949年10月11日，杭州市政府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取消旧社会的“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基层组织等相关事宜。

同年10月23日晚，上羊市街率先成立了“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拉黄包车出身的杭州小伙子陈福林，在当时的西牌楼小学会场当选为首任居委会主任。当时投票的有200多名居民代表，代表着上羊市街的2000多位居民。

这些历史细节的考证而出，源于2007年民政部向社会征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考证资料。当时，济南、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曾努力调查取证，追寻这一“新中国第一”。当时民政部给出的条件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名称为居民委员会，地域为城市，组织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结构为民主管理的委员会制”。最后认定，上羊市街居委会是“全国第一”。

上海也找寻到了本市第一。1999年5月，黄浦区宝兴里的

